

傅莹：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能否实现良性竞争（I）

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

文/傅莹

2020年2月，我和几位中国学者一道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。这届会议报告的主题是“西方的缺失”(Westlessness)，从欧洲人的视角看“西方”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。这是一个有历史纵深的理论性问题，引发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，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冲淡。

当时正值中国新冠疫情最困难之际，与会的美国政要们不仅对关于疫情的讨论或信息没有兴趣，而且抬高对中国批评的调门，纠缠华为5G、香港、新疆等问题，强势要求欧洲人站队，试图形成对中国战略竞争的西方统一立场。把如何应对“中国崛起的威胁”作为与会的主打话题，污蔑华为产品是“中国情报系统安置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”。他们指责中国奉行“胁迫性的海洋政策”，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挑衅他国等等，同时宣称“西方没有没落”“西方价值观将战胜俄罗斯和中国对‘帝国’的渴望”，要求欧洲与美



国共同应对“中共不断增强的进攻”

美方的持续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，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。

中国与美国“一进一退”

观察美国政策的改变，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。

中国判断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，顺势而为，坚持改革开放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。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构建起全球合作网络，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。

而另一边，美国却沉醉于“历史的终结”和单极秩序，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，发动了多场战争，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。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资本的扩张

缺乏有效管理，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。同时，美国国内矛盾解决得不好，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，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，政治日益极化。近年美国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，不少人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路线是不成功的。特朗普政府索性放弃自由主义国际政策，大搞保守主义和本国优先，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，“灯塔效应”也变得黯淡。

中国与美国的“一进一退”，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，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。

外界普遍担忧：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即所谓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冲突？多边全球合作的架构是否会因此分裂

甚至崩塌？

对华战略关键词：“有原则的现实主义”

慕安会结束后不久，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。4月上旬，美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这场“全球大流行病”的新“震中”。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。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“9·11”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，尤其是后者，使美国陷入严重困难。当时世界各国鼎力支持，与美国一道共克时艰。然而这一次，美国在全球层面没有释放团结合作的信号，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，不仅不出面组织国际防疫，还试图阻碍合作、制造对抗，令世人惊诧。

国际社会最初对中美合作抗疫是抱有期待的。一方面，经过13轮艰难谈判，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在2020年初签署，延宕一年有余的经贸摩擦终于得到缓解，给持续下滑的双边关系踩了刹车。另一方面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根据中美2001年携手反恐、2003年合作抗击非典、2008年同舟共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，以及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的经历，人们

习惯性地预期，这次两国仍能将这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转化为改善关系、恢复合作的机会。

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愿。武汉疫情发生后，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关心和开展合作的愿望，而是单方面撤侨、断航，商务部长罗斯将中国疫情称作“加快工作机会回流的机遇”，言谈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人道关怀。美国有一些企业、个人和华人华侨给中国送来了物资援助，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信息，没有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实质性援助。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评论文章《中国是真正的“亚洲病夫”》刺激了中国民众的痛苦记忆，引爆两国间舆论对立，在美方拒绝道歉的情况下，中方取消三名驻华美国记者的执照，而美方则压缩了驻华盛顿的中国记者的人数。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的中美关系缓和势头很快被冲淡了。

但此后，美国国内疫情的暴发和失控，导致经济衰退，并牵动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。特朗普政府为了转嫁防疫不力的责任、保选情，采取“推责中国”的策略，掀起批评中国